

火车,作为一种意象,常出现在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之中,那些丰富的、绚丽的景象,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。列车,如同一节一节小树桩的绿皮车,绘着金黄色腰带的红皮车,牛奶一样从原野上一滑而过的动车,在艺术家眼里不再是交通工具,而是一种文化象征,蕴含了一种美感。在他们的镜头之下,列车消失了原有的体态,与长长的蜿蜒的铁路线,与看惯了欢聚和离别的站台,一起呈现着一种特殊的人生况味。

不过,这样的列车是虚幻的、不真实的。在普通男女眼中,列车只是我们要出行时可供选择的一种交通工具罢了。这个一次可以容纳一千余人的巨大容器,带着我们穿山、过河,从北方到南方,从西疆到东海,到达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。当我们乘上列车,在车内坐着、站着、躺着或是走动的时候,我们的视线只集中在列车之外一晃而过的景色上。列车之内呢,不停忙碌的列车员,戴着大檐帽,扎着领带,肩章上带着一条杠的列车长,他们是我们旅程中长久的伙伴,可是在各式各样的传言中,我们似乎并不太理解和信任他们……

二

从青岛至南宁的列车在原野上快速滑行,两位中年农民工坐在我的身旁。他们没带任何行李,张嘴说话便是一种难闻的气味,这足以令我不喜欢他们。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血,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没有转头看他们一眼。

这趟穿行7个省、停靠36个车站、运程长达3000公里的列车内,60%的乘客是农民,硬座车厢内,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80%。它的运行路线,决定了乘客的身份——曹县、菏泽、麻城、阜阳等,都是农民工输出的集中地。这些如同符号一般散落在广阔土地上的人们,扛着蛇皮袋,拿着喝水的大茶缸、方便面,独自或是带着妻子、孩子,聚集到列车这块方寸之地,高速旋转的车轮代替了他们的脚步,青岛、南昌、南宁等城市是他们的目的地,那里有他们想要寻找的生活。

车厢内的味道极其复杂,随着省份的不同、地域的变化,以及乘客的下车上车,味道也在不停地转换。液体的味道、头油的味道、呼吸的味道、行李的味道、各种食品的味道……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,纠缠在一起,形成复杂的“火车的味道”。

巨大的行李搁在行李架上,里面不仅有厚实的棉被,也隐藏着铁制、玻璃制品或是能够引发火灾的危险品。各种品牌的方便盛进塑料袋挂在衣帽钩上。年轻的列车员不停地整理行李,要求乘客拿下衣帽钩上的物品。她们是一些20来岁的年轻女子,来自山西、甘肃、宁夏等地,她们有的是农民的后代,当然也有家住城市的青岛当地女子。这些年轻得如同花一朵般的少女,每人看守一节或是两节车厢,保持着车内的清洁、乘车的秩序还有行李架上行李的安全。

保证安全,不仅仅是防止行李掉下来,还要发现隐藏在其中的危险品,予以清除。危险品检查就在整理行李时进行,铁器、玻璃制品一定要搁置在座位底下,这样才能防止坠落伤人。这时,一位乘客不理解,大叫:“我的东西想放哪就放哪!你们这是服务吗?你们是管人!”年轻的姑娘一遍一遍地解释,他就是不听,只能把列车长喊来。

列车长似乎是整趟列车最忙的人了,乘客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得管。列车长得不停地在车厢内巡视,做很多的事情,比如查看车门是否锁闭、捡起旅客丢在地板上的烟头,将靠在热水箱旁的男子叫到旁边。这些事情琐碎而又凌乱。那些乱丢弃烟头的男子,大部分能够接受劝阻,也有一些人会大发雷霆,拿着香烟在车厢内叫:“凭什么管我?凭什么不让吸烟?”或者会说:“我不知道车厢内不能吸烟。”“车内写着提示标语。”“我不认识字。”最后向他解释说:“为了安全。”

的确,未熄灭的烟头扔到行李、车窗夹缝,垃圾筒或者碰到乘客的衣服,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火灾。这样一个盛满旅客的、高速运行的巨大容器,如果发生火灾,那情形简直不敢想象。那名不听劝阻的旅客仍在叫嚣:“烧又烧不死你。”有人看不下去了,说:“公众场合就不应该吸烟。”他才作罢,拿着燃烧的烟卷恶狠狠地开展到车厢连接处。

车厢连接处聚集着大堆的旅客,铺着毛毯坐在上面打牌的青年男女,侧着身子、伸出一条腿站着的抽烟者……白色的气体从他们的口腔、鼻腔喷出,盘旋在每个人的头顶。没有任何处罚手段应对在车厢内吸烟的旅客,除了一遍一遍的宣传和教育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止吸烟的旅客随意丢弃烟头,除了批评、教育,除了替他们捡起烟头,即便烟头旁边有一口颜色可疑的浓痰。

三

像每个极少出门的居家女人,我盼望这趟旅程,期待火车上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。然而,一天一夜过去,最初的新鲜感完全消失,疲倦慢慢袭上心头,我才发现最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。列车大部分时间在远离人烟的群山、田野、河流旁行驶,特别是进入广西境内,便是一个接一个的山洞。白天接续

■讲述

用心良苦

□刘明杰

薛永年教授从国外回京后,给我发了一条短信:“明杰:我已于昨夜返京,欢迎今天来家小坐,带《诗刊》来。来前电话告知。薛永年十一日。”当时,我正在上海的地铁上,去松江区见诗人、画家徐俊国,便回了短信:“薛老师,我现在在上海,明天上午到北京,到京后我再约您吧。晚生明杰。”我看着收发的短信,心里美滋滋的,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,又涌上了心头。

我想起了之前拟考博士的一些事情。我读研究生期间,曾考虑过要考博士,为进一步学习山水画创造环境。于是,我踌躇满志地报考了南京一所大学。一些人听到了这消息,对我的梦想说三道四,我平静的心也开始变得波涛汹涌了。但是,在影子的陪伴下,我还是犹豫而狐疑地来到了充满“诗意”的金陵。当时,我心中摇摆,举目无亲,并没有感觉到金陵如古典诗词上所说的那样如诗如画。

神情沮丧的我,踉跄而行。忽然,一个念头从我的心中划过。我想起了在河海大学任教的张彦德,他曾是我在故乡教书时关系还不错的同事,后来他到南京任教了。我找到他,并让他帮忙联系博导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找到了一位在读的女博士生,她斩钉截铁地说:“如果你没有过硬的关系给引荐的话,基本上没有戏。”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,但这无疑更加打击了我原本微弱的信心。这一句真心真意的话,如严冬时的一盆冰冷的水猛然浇在我热血沸腾的身上,心被彻底冻了。第二天,我答谢了帮助过我的朋友,失望地回到了读研的学校,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的事情,暂时终止了考博的念头。

硕士研究生毕业后,不谙世事的我企图毛遂自荐,但是每个高校苛刻的条件都把我的心击得粉碎。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,我只好赋闲在家,自学诗词书画。不久,父母的长吁短叹和我不服输的性格使考博的念头又起。这次我认定了仰慕已久的薛永年教授,仿佛是一种直觉。

我又只身来到北京,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央美院,试图拜访薛教授。不巧的是,那天他不在学校里,我于是想向他的同事求得他的电话,以便另找时间再联系。我厚着脸皮,挨个办公室去询问,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冒险告诉我。在他们看来,我是一个不知来历和底细的,人人都得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可怖闲汉。无奈至极,我又返回一个办公室,再次向一位女老师哀求了。这次,她似乎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坏人,终于发了慈悲,把薛教授的电子信箱给了我。我感激在心。

我喜出望外地离开了中央美院,便急切地找了一个网吧,给薛教授发了一个简短的邮件,把我强烈的愿望和真实的现状都写在里面了。我遂日复一日地盼望着佳音。在这期间,我联系到了薛教授的在读博士生,他及时地给了我考央美博士的相关书目。我回家后,便赶紧买来书籍,闭门谢客,面对着书山,不分昼夜地生吞着书本上的知识。

一天,我无意中在邮箱里看到了薛教授的回信。大意是说,因出差没有登陆邮箱,所以就没能及时给我回信,情况已知悉,并鼓励我为理想而奋斗。我有些受宠若惊。

然而,愿望是美好的,现实是残酷的。薛老



■现场

火车火车跑得快

□郝炜华

夜晚,夜晚连接白天,它就像大地的一个孤儿,日夜不停地在那苍茫天地间独行。

家,此时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列车长、列车员则极少谈及他们的家人。数次或长或短的交谈,使我感觉他们是一群不要家的。添乘的队长说,他一个月有20多天待在列车上,他们的正队长几乎成月待在车上。车队长与列车长都是已经娶妻生子的男人,他们说:“与爱人谈恋爱时就是这样,她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工作方式。如果接受不了,不会跟我们结婚。”又笑言:“我们这种人,不离婚,就是赚了。”

其实他们对家还是满怀愧疚的:“回家就多干活,到市场买菜,给老婆孩子做点好吃的。”看守卧铺的临近退休的大姐却说:“回到家,俺老公就叫俺歇着,说在外边这么多天,辛苦。”餐车内一位极少言语的师傅说,他的孩子,从来不舍得打,跟孩子待的时间少,总感觉欠孩子的。他与妻子都是列车员,遇到两人都上班的时候,孩子就挂着钥匙自己上学、放学、回家。

一直在路上,一直在行走,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。上了列车,就是“离地三尺”的日子,只有到站的几分钟才可以接一接地气。其他时间都在列车上,晃来晃去,晃来晃去,眼前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面孔,耳朵里是连绵不绝的“咔嚓”声、“咣当”声……

列车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临时停车,它的对面停着一趟同样的列车。餐车内的乘务、餐车师傅立即透过车窗招手,对面亦有列车员、乘务向他们挥手。这是行驶在这条铁路线上的4趟南宁车队中的两趟,它们有幸在漫长的路程中会车,时间不到一分钟。同属一个车队的亲密同事,在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地方隔窗相会,彼此微笑,相互注视。

“有没有夫妻、父子、兄弟隔窗相会?”这样的相会,如果写成通讯报道或是小说、散文,加上煽情的描述,必定催人泪下。他们摇头说:“没有。”

四

人流如潮水一般涌来,站在旁观者,有一种魔幻般的不真实感。他们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?这样的聚合、离散、蜂拥、消失,无数次的演绎,如同镜头一遍一遍回放。他们有着同样硕大的包裹,却操着不同的口音,向往不同的目的地。

列车员一边查验车票,一边喊:“注意脚下,注意安全。”我更担心她的安全,那样瘦弱的身体被旅客或是包裹挤下站台,该是多么可怕。记得1990年的一个夜晚,一趟开往烟台的列车严重超员,站台上的乘客非要上车,列车员为了运行安全不让上车,乘客二话不说一把将列车员拽到车下。时至今日,我还记得那个矮小的列车员脸上惊悸、讨好的笑容。

车厢内立刻拥挤,穿行的步伐艰难起来,很多时候必须贴着旅客的前身、后背才可以通过。“这已经很好。”列车长说:“春运期间,6节硬座车厢,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。”人最多的时候,车厢连接处,两平方米不到的地方,挤了27名旅客。上不

师曾这样对人说起我的情况:“明杰并不是不用功,相反他有一种强烈的时不我待的危机感,更有悬梁刺股的精神,而且悟性也很高。虽然,格律诗词写得还可以,但是,从美术史论这方面来看,由于他不是中央美院的学生,所以直接导致了他要和从央美毕业的考生们竞争。这对他来说,无疑是吃了大亏。”我知道薛老的语中之意和言外之情,他是有感而发的,而且都是为了我好。我心想,考博也是为了画好画,不如先提高绘画水平,有了一点浮名,等手头不拮据了,那时再考。于是,我便开始了艰难地“化缘”,之后就去杭州进修山水画,考博的事就又拖延了。

在杭州进修之际,朋友王常信引荐我认识了当时98岁高龄的孙天牧先生。孙先生是国画大师陈少梅的入室弟子,在山水画上成就很高。我有幸成为了孙先生的关门弟子!更想不到的是,恩师临终前把我认真地托付给薛教授。

记得恩师次子孙树德先生在引荐我初次登门拜访薛教授的时候,说:“孙老让我转告您,明杰值得我们去费心,您要好好地栽培他。”当时,我的心都快要被融化了,热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这使我这个来自农村的一贫如洗的傻小子,在恩师羽化之后,可以名正言顺地经常去薛老家里聆听教诲,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,我不再是寂寞而忧郁的独行客。

地铁到站的报站声,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
一回到北京,我就和薛老师约好,下午3点去看他。我准时按响了门铃,薛老师一看是我,就热情地招呼我进屋。

在论诗话词之余,薛老师又关切地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。我答道:“除了临池、吟诗之外,我听取了您的教诲,吸取了古代的一些技法进行训练。前段时间去黄山和庐山图真,我试图用古法图真,画出既有古意又不乏生机的山水画。”薛老师肯定了我的想法,说:“宋画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高峰。‘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’,它看上去很生动、真实,但是在生活中却又找不到原型。元明清的绘画从某种意义上说,都是从宋画中变化出

普通话说得异常流利,但是一说起方言就像是听不懂的外语。独自在马路上行走,感觉到家的距离与遥远。

不知道2009年4月1日,第一次值乘这趟列车的小姑娘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恐惧。她们穿着厚羊毛衫、厚毛裤到达南宁的时候,穿着短袖衫、短裤的当地人肯定会诧异地看着她们。有时候真实比魔幻更加令人不敢相信,她们仿佛一不小心就从冬季穿越到了夏季。行车公寓在铁路旁边,红色的、绿色的列车一趟接一趟驶过。屋内的地板渗着晶莹的水珠。空调用红色的格子布包得结结实实,当地规定:不到六月份,不允许开空调。

为了这趟开行,为了保证车厢内的清洁,列车长与列车员拿着钢丝球刷“地边”,从下午3点一直刷到夜里12点,累得坐在地板上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嘴唇蠕动,却说不出一句话。行车途中,地板必须洁净,没有瓜子皮、碎纸片、烟头。一名列车员累得头晕、呕吐,到了南宁就发烧,打点滴,站着去的,躺着回来。给妈妈打电话,哭着说:“太累了,长这么大没受过过这样的苦。一名同事的鞋子都跑掉了。”

四月份,还不是最苦的时候。七八月份从青岛到南宁一路高温,车外温度30度左右,车内温度则更高,鸡蛋放到车窗边上,不长时间呈半熟状态。一趟行程下来,七八位小姑娘偷偷跑掉了。坚持下来的小姑娘回想那两个月,说:“感觉像做了场噩梦。”

绿皮车换成带空调的红皮车后,情况得到了改善。领导不再给列车员发小孩子用的痱子粉了,因为脖子、腋窝不起痱子了。小姑娘的裙裤也换成普通的工作服。

行车公寓后面是个偌大的广场,音乐此起彼伏,跳舞的、唱戏的、拉二胡的、打电子枪的、蹦极的……炎热,造就了南宁人热闹、漫长的夜生活。晚上10点多,稍事休整的列车长与列车员排成两队走出行车公寓,广场上的南宁人依然在唱着、跳着。

他们默默地走着,穿过铁路桥、穿过小吃摊、穿过火车站广场,与旅客一起通过安检、候车室,进入站台。列车已经停靠站台,如同守时的不离不弃的情人静候着他们。他们散开,走到各自的工作岗位,开始了新的旅程。

穿着深蓝色棉衣的老年男子执意在红色木质踏板上睡觉。年幼的孩子趴在地板上吃东西。带着两个月婴儿去岳母家的男子心起歹念,偷走女乘客的钱包,火眼金睛的乘务将他抓获。女乘客执意要送锦旗。

锦旗、感谢信、临别前的感激是列车长与列车员经常收到的“礼物”。一位儿女在国外的老年妇女受到列车员的照顾,感动地说:“你们真的比我儿子还好。”衣着干净、举止优雅的女人对忘性碌的列车员说:“谢谢,谢谢。”

有乘客深夜赶到车站,等候列车的来临,只是为了送一面锦旗,因为他的提包遗忘在列车上,被列车员捡到,辗转数日,交还到他的手里。有中年男子买了水果一定要列车长收下,因为他读大学的女儿登车时丢了所有证件、钱,列车长用自己的钱为女孩补上车票,吃饭时送去盒饭。一位坐卧铺的女乘客与男友吵了架,心烦气躁,将果盘里的瓜子皮全部丢到地板上,列车员扫一遍,她丢一遍。到了第三遍的时候,女乘客不好意思了,说:“对不起,我心情不好,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有乘客与列车员成为朋友,每逢节假日都会发来短信,给这些一直在路上、一直在行走的“路遇者”送去真诚的问候。

这是一些令人感到温暖的橙色的画面,与那些不解、误解、不配合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列车生活画卷。

六

两名男子一边抽烟一边闲聊,男子说:“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事业编制吧。”又说:“火车上的饭菜肯定是劣质的。”另一位说:“不可能,工作人员也吃那样的饭。”是的,很多列车员不是事业编制人员,而是劳务工。他们在列车上为乘客们尽力地劳作、服务。

不知不觉地,火车到达了永福火车站。枝叶茂密的树木点缀着这座位于矮山脚下的车站,天空蔚蓝、空气清新、香气飘浮。这是全国著名的“福寿之乡”,全县有30多位百岁老人。在这个寓含着福与寿的美丽地方,我对着列车员举起相机,车队长说:“笑一笑,开心一些。”列车员绽开了笑脸,那是一名19岁的少女,脸上的笑透着青春和羞涩。

在淄博火车站,我结束漫长的旅程,目送列车驶离站台,继续它的行程。张贤忠、盛显德、张庆利、李亮、吴刚、李允新、张平、乔绪从、龙燕……这是我一路接触到的列车工作人员,他们的身份是铁路最基层的管理干部、工人和劳务工。他们工作在铁路第一线,在服务旅客的同时,背负着人们对铁路运输的期望:每个人都能坐上列车,每个人在列车上都有座位。

当这些期望不能满足的时候,人们将牢骚、不满、指责、抱怨全部倾倒在他们的头上。他们没有说话。他们像任何普通人一样需要这份工作,要挣钱、要养家、要生活。如果可能,通过这份工作实现人生的梦想。这个岗位、这份工作决定了他们不能说话。

出行之前的不解、臆测,此时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

霍春阳作品

来的。你不仅仅要学习、借鉴古人的笔墨技法,更要学古人之心。”

那天,薛老师还对我提出了很多绘画上的建议:“艺术也是需要不断地往前发展的,在定格了某种风格之后,也可以去学习、吸收与之相反的风格。同时,必须避免走向极端,方法是圆中寓方或方中寓圆,如此也会使得用笔变化多端、耐看,这里面有辩证的因素在。”他后来又接着讲了古代很多著名画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“画道”。他认为,在学习画画时,最好是一边学习古人笔

墨技法,一边去大自然中图真、创作,这样会收到很好的效果,画中有古意,也有了生机,慢慢地也就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。

我见薛老师谈了很长时间,明显有些累了,便让他赶紧休息一会儿。回家的路上,我边走边想,薛老师知道我对考博的想法和态度,所以我每次登门拜访时,他总是孜孜不倦地为我讲绘画方面的知识。我心里明白,薛老师是在试图弥补我心中的遗憾。这份长者的良苦用心,对于晚辈来说是多么珍贵。